

11/10



仙居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仙居县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政协仙居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主 任：金烈芳

副主任：任婉萍

委 员：黄冬初 谢淑泉 袁家玲

编辑：石玉生 王均明 林 青 赵邦铎

校对：王均明 林 青 赵邦铎

目 录

为振兴祖国制革事业奋斗终生的张铨博士……沈在秀（1）

纪念长兄张铨逝世十周年……张 钊（8）

忆沈哲臣先生……吴 平（12）

身居异国 情系故园

——记沈策先生爱国爱乡的几件事……黄冬初（17）

“开拓型所长”陈泽深……周大平（20）

上海工商界有竞有争的仙居人

——王靖东传略……王均明（23）

解放前夕的仙居城……沈焕善（34）

南北干部会师 仙居县城解放……陈子清（36）

步路遭遇战……陈如源（42）

宜昌外围小溪滩和天宝山战斗追记……朱鸿飞（46）

倭寇侵仙史实纪略……沈焕善（49）

仙居旅沪同乡会……张言亲（51）

国民党盐务官吏王鸿琦……应荣川 潘行善（53）

打盐厢的领头人张大牛……县志办公室（56）

辛亥革命志士王躬锦（附照片2张）

……杨总灯 王加友（60）

仙居县第一所初级中学的创办（附照片4张）

……顾荣乃（62）

清末民国期间的仙居小学概况·····	林 青 (70)
1935年创办上田小学追忆·····	杨儒风 (73)
郭哲卿与冲庵书院·····	郭金星 (76)
九三学社成员张震旦教授·····	沈在秀 (79)
浙大老讲师王凤扬·····	陈静秋 (81)
仙居老教育工作者王家瑾·····	县志办公室 (83)
有情任高唱 无事乐潜居	
——记我的父亲朱寿朋(附遗墨)·····	朱丽芬 (86)
皓首云山名中医蒋焕声·····	陈如源 (93)
悠悠故乡情 拳拳爱国心	
——记陈静秋先生·····	张 坦 (98)
版画家郭载美事略·····	沈在秀 (101)
含笑喜看风流处 正是桃李芬芳时	
——记二胡演奏家沈汉志·····	李盛富 (104)
抗日战争时期的上王剧团·····	王宝琪 (108)
仙居佛教简况·····	张言亲 (110)
古灵祠与陈襄·····	谢淑泉 (113)
仙居摩崖大“佛”字(附照片1张)·····	谢淑泉 (117)
仙子宅第洞穴奇(附照片4张)·····	金烈芳 (121)
下汤原始社会村落遗址(附照片2张)	
·····	谢淑泉 郭金星 (125)
建国后仙居火腿的发展(附照片1张)·····	朱来福 (129)
陈贤堂与仙居印刷厂·····	应 华 (133)
仙居王万丰中药店·····	张家业 王均达 (135)
大邵造纸简述·····	张家业 (138)
仙居第一平民习艺所·····	应 华 (141)

打铁世家·····	余相泉口述 应华整理	(143)
仙居烧饼·····	张言亲	(145)
仙居县的公路建设·····	根据仙居交通志整理	(147)
建国前的仙居邮电·····	顾三亨	(149)
“点灯不用油”的开端		
——创建光明公司追忆·····	汪静波	(152)
五都潘水力发电站简介·····	张 津	(156)
大北地溪林场(附照片3张)·····	顾荣乃	(159)
万绿丛中的方小康·····	朱世练	(165)
林谚·····	朱世练辑	(167)
民国时期禁烟禁毒与习俗改革·····	张言亲	(170)
国民党仙居县政府的机构设置、编制与奖惩		
·····	杨总灯	(173)
东南宿舍与西乡公寓·····	林 青 王相法	(178)

为振兴祖国制革事业 奋斗终生的张铨博士

沈在秀



张铨（1899、10、11——1977、11、2）字克刚，城关西门村大前里人。著名学者，大学一级教授，我国现代制革事业的前驱和宗师。

张铨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年少时曾边读私塾边于农忙期间帮助家里放牛。从他的家庭经济条件来看是有可能升学深造的，但他父亲“望子成龙”，很支持他读书求学，期待着他学有出息，为国为家争光。1913年冬季，在城内基督教会主办的芥种小学毕业后，张铨由教会推荐保送入杭州之江大学附属中学部读书。之江附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不经入学考试直接升入之江大学。因在杭读书费用较大，他父亲曾多次只好变卖房屋和耕地给予接济，张铨不忍家境为他逐步破落，一家父母弟妹为他一人读书过着更为贫困的生活，于1919年春季在之江大学读了两年之后，即中途辍学去省立第七（金华）中学教书，待积攒起一点钱以后，再于1921年秋季考入燕京大学制革科（院）继续读书。1925年夏，以全科最优成绩毕业并被留校担任助教。张铨原在之江大学是攻读化学专

业的，曾接触到一些制革知识。伟大的“五四”运动激起了他心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波澜，当他在金华和故乡仙居亲眼看到广大农村皮革资源丰富，却因祖国制革工业和制革工艺落后，只能以低廉的价格出口原皮，财富被大量外流等情，使他感触甚深，促使他选考了燕大制革科，决心要用科技改变这种局面，为祖国皮革工业的振兴而奋斗。他用以激励和鞭策自己的座右铭是：我国农民生产了这么多的原皮，他们应当有自己的皮鞋穿！

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进军，使北方的封建统治集团惶惶不可终日，支持北洋军阀的帝国主义势力开始对革命进行要挟和施加压力，千方百计阻挠革命形势的进展。燕京大学系美国基督教会利用敲榨去的我国庚子赔款建办起来的，当时以美人司徒雷登为首的一批外籍职员纷纷离校回国，学校经费被削，张铨所在的制革科两名美籍教授也回国不归，只留下助教张铨一人，校方决定撤销建制。在当时，作为系统培养专业人材的专门学科，燕大制革科那时在国内是唯一的；制革科如被裁撤，势必影响甚至中断我国制革人才的培养和制革工业技术队伍的建设。考虑到这个情况，张铨一时坐卧不安，食饮无味，极为着急。但是，那个时候，学术界论资排辈，等级森严，张铨作为一个执教鞭的助教，特别是在象燕大这样洋人开办、博士教授成堆的高等学府里，只不过是被人看不上眼的无名小辈而已，他能对挽回由洋人独揽大权的校方错误决定起到多大的作用呢！然而，“位卑不敢忘忧国”，张铨满怀着科学救国的激情，见义勇为，坚持向校方进行说理斗争。在燕京大学广大爱国师生的支持和声援下，张铨以唇枪舌剑，软磨周旋，几经交涉谈判，终使校方不得不改变决定。但校方为保全面子，在名

义上把制革科与原化学科合并为工业化学科，而课程则仍以制革为专业；任美籍威尔逊为该科教授，张铨为助教。但这位威尔逊教授是挂名不管事的，整个工业化学科的教学工作实际上是张铨一人顶着干。1927年暑期一过，燕京大学制革专业照常开学，一时因师资无源，张铨只得一人担当起原来二个教授、一个助教的全部工作，这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个人精力、学识有限的问题，更为突出的还有缺乏信任和威望的问题，当时的困难确实是难以想象，但是一个学期过来，所有这些困难的冰山都被张铨以火一样的爱国热情融化掉，在“主人”意欲“拆摊”的危局中，把国内独一无二的制革专业支撑下来，并稳稳地站住脚跟。

在旧社会，制革工作者被认为是地地道道的“臭皮匠”，中学里的一些高材生毕业后一般都不喜欢升考这个专业，有的已考取这个专业的也因有些后悔而表现不安。为此，每逢大学招生考试前，张铨还亲自拎包到北京一些重点中学去作升学指导报告，宣传振兴祖国皮革事业的重要意义，苦口婆心，奔走呼号，动员和争取更多品学兼优的中学毕业生去报考制革专业。在教学中则十分重视抓学生的思想教育，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提高爱国主义思想觉悟。年已耄耋的成都科技大学皮革系教授张文德，原是燕京大学工业化学系（皮革专业）1928年届的毕业生，他回忆自己当初在学习曾一度以为读了大学还做“臭皮匠”真划不来，准备转科学习。是张铨及时地同他促膝谈心，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张文德解开思想疙瘩，明确学习皮革专业的意义，从而明确目标，刻苦攻读，成为全科学业优秀的学生，毕业后留校同张铨一起担任助教，成为与张铨并肩战斗的战友。张文德时至今日还清楚地记得张铨那次同他谈心的最后

一句话：“好吧，我的好老弟，为了祖国制革事业的振兴，让我们好好地干一番吧！”张文德无限感慨地说：“正是张铨这一席话，更重要的是他的身教，使我同皮革结下了不解之缘，心甘情愿地当了一辈子‘臭皮匠’！”

1937年6月，张铨以年近四十的壮龄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皮革研究院留学。当时北平学术界包括外籍教授在内的不少权威人士都以为张铨年岁已大，再去留洋深造已不会有什么出息。张铨自思机会难得，兴致勃勃地出国去了。他在美国如饥似渴地汲取新鲜知识，钻研制革技术，苦读三年，年年总考成绩名冠全班，先后连得理科硕士、理科博士学位。他在博士论文中富有创建地提出了植物鞣质与皮胶原结合的吸着理论，是国际上颇有影响的辛辛那提学派建立的植物鞣吸着学说的开篇之作。张铨也由此开始在国际皮革科研上受到注视。

张铨留美三年后准备学成回国。听说张铨要回国，美国有关方面曾多方设法争取他留在美国工作，提出只要他答应留美国，就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和先进的科研实验设施，张铨笑而不答；美方考虑他的爱人潘缦卿和两个孩子还在日寇占领区北平，就又提出把她（他）们尽快地安全接到美国来安家，张铨还是笑而不答。张铨究竟要的是什么呢？在劝说他的温德森等几位美籍导师的穷问下，张铨诚挚地对老师说：“我要的是发展祖国的皮革事业，振兴中华！”“这三年，我人虽离开生我的地方，但我的心却一直是和祖国在一起的。”几位美籍导师被深深地感动了。他们看到，一颗耿耿的爱国之心，即使拿世界上最宝贵最高价的物质也是无法交换的。他们敬佩张铨的爱国热情，建议美方帮助把他的家属从北平接到香港，成全张铨的爱国行动。1940年8月，张

铨离美到香港和从北平逃离出来的爱人、两个孩子相见后，即取道越南归国，开始执教于重庆的华西大学，任化工系主任，兼四川大学理科研究院研究指导教授。那时正是抗日时期，物质生活维艰，张铨以夙兴夜寐的精神进行工作，他在校内不倦地进行教学和研究，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材和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特别是于1941年在美洲皮革化学会志上发表论文，提出了单宁与生胶原的结合的观点是物理——化学的总和。在此以前百余年世界各国学者关于植物单宁鞣革理论的见解，或说是化学结合，或以为是物理结合，各有启发但同时也不具全面的说服力；张铨的论文在国际上被认为是对过去百余年植物鞣革理论的科学总结，影响强烈。同时他还深入社会调查皮毛资源和制革工艺、设备，作了不少合理建议。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腐朽和经济破败，他的努力使重庆和四川省在抗战期间的制革业虽有一定的发展，但对整个国计民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又热衷于挑起反革命内战，更把国民经济弄得百孔千疮，面临总崩溃的边缘，张铨痛感报国无门，只落得空怀壮志，徒唤奈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张铨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四川一解放，张铨即被任命为四川工学院（后改称成都科技大学）皮革教研室主任。并被推选为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党和政府的关怀、器重，使张铨的心情十分激动，他表示一定要把后半辈子的全部精力用来办好党的制革事业，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鉴于我国猪皮数量较多却未能用来制革，在1951年召开的全国制革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猪皮制革的重大倡议，并于当年在成都市举办了全国第一个猪皮制革短训班，使猪皮制革在成都市和四川省首先

开展起来，1952年大专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以后，四川工学院设置了全国第一个制革专业——制革系，以张铨为主负责筹建并对高水平地建成这个系做出贡献。1955年，林业部聘请张铨兼任该部植物鞣料研究室主任。1964年应轻工业部部长李烛尘之聘，兼任高等工业学院皮革工业专业课程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铨还先后被选任为中国化学化工学会理事、四川省化学化工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科普协会副主席等职。在教育界和学术界这些本兼职工作中，张铨总是认真负责地干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厌恶只挂空名不干实事。

张铨治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他生前曾利用寒假进行社会调查，先后亲自到陕西、内蒙、北京、安徽等省市和四川西部地区农村考察研究、采集标本，实地学习。这反过来又加深和丰富了他在制革方面的理论知识，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在国内和国际上发表的重要科研论文11篇，调查报告和专论5篇，并主编了我国第一部高等院校统编教材《皮革工艺学》，对皮革蛋白质化学、植物单宁的研究，以及开发国内植物鞣料资源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并对发展我国皮革工业和改进皮革工艺提出一系列合理化建议。1959年9月，他率领我国皮革专家小组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皮革学术会议，并代表我国在会上宣读论文，博得与会各国专家的赞赏，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张铨一生在大学任教半个世纪，他的主要贡献还在于为我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制革学者和高级专业人材，仅建国后他担任的四川工学院皮革专业即有毕业生1000多名。他的学生遍及了我国各个大制革厂和皮革科研机构，成为我国制革教学和科研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其中有不少已是科学院学部

委员、大学教授、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如在国内外交有声誉的学者曹天钦、杨天一、杜书东、管玉泉、卢梅村等等。在他们的身上凝聚着张铨的心血和汗水。

张铨于1950年10月由黄宪章、王廷弼介绍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为民建泸州市筹委、四川工学院小组组长。他在政治上坚决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他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一定会振兴。他在双目失明、重病在床之际，仍不时向前来探望的同事们询问制革教学和科研情况，并一再向在制革系任教的孩子叮嘱他未竟的事业，却未嘱托一件家事。1977年11月2日，张铨不得不丢下他的事业与世永别了。但是在今天，在四化建设胜利进展，我国的制革事业有了新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在旧社会被嘲笑为“红脚梗”的广大农民开始穿上皮鞋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引起了对他的由衷怀念。

纪念长兄张铨逝世十周年

张 铨

今年（1987年）11月2日是大哥张铨逝世十周年。大哥长我二十四岁，在他离开故乡上北平求学时，我还未出世。1976年夏，我去成都探亲，在大哥家里住了一个月，我们弟兄才第一次相聚，想不到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大哥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矢志以科学救国振兴中华为己任，发愤图强，孜孜不倦，报效祖国，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大哥给我的教诲很多。虽然我们弟兄从小没有生活在一起过，但在我上小学有点懂事的时候，就从父亲口里知道他的一些事迹。父亲好象讲故事一样教我们要以大哥为榜样，勤学苦练，立志做一个知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人。以后，大哥也经常写信鼓励我们努力上进，刻苦读书，教育我们怎样对待前途，怎样对待生活，对我影响至深。值此大哥逝世十周年之际，就我所见所闻，略述片段，以表纪念。

大哥治学严谨，博闻强记。他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实干苦干的精神。早在芥种学堂读书时期，他就养成了勤奋好学一丝不苟的习惯。他写的作文内容丰富，文句流畅，书写优美，令人百读不厌。他初学英语，因为单词多，易遗忘，回家就一遍一遍地诵读。有时还要父亲帮助读记，如英语老鼠读什么？猫读什么？先教给父亲记住，然后反回助读。抗战时期，他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曾写信告

诉父亲，除了英文他还懂得日文、法文和德文。他说过去学了ABC就算懂洋文了，不知道天外有天。并以此勉励我们弟妹学好各门功课。五十年代后期，他年近花甲，为了赶超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翻译国际学术著作，还克服工作繁忙和记忆力减退的困难学会了俄文。

大哥毕生从事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不计功名利禄。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1921年他毅然远离家乡去北平攻读，在燕京大学勤工俭学，好不容易坚持到毕业留校任教。旧社会对“教书匠”是瞧不起的，他所学的又是制革专业，还被看作是“臭皮匠”。当时我父亲也不理解，说他太忠厚老实，不会当官，被人说成是“皮鞋师傅”，但他并不介意，还是矢志不渝，热爱自己的专业。1937年，他年近四十，已经当了好几年制革系主任，也不顾别人讥笑、阻挠，远涉重洋去美国留学深造。他说：“我出国，不是为了吃洋面包，镀金，我要探求新知识，研究先进科学技术，回国为振兴实业贡献力量。”他从来不说自己有什么成就，在学术上有什么地位，担任什么职务。直到他学成回国后，听说在仙居国民党地方政府乡保长曾经指名要抽他的壮丁，他很生气才写信对父亲说：“我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国际上也摘录我的论文，与我一样在国内只有几百人，乃国家之宝贝，理应受到器重，他们还要叫我去当兵？”他说：“爸爸常说我不当官，没有地位。我生性愚笨，愿意象祖父一样，祖父不是字‘守拙’嘛，最近我应邀到重庆，国民政府答应给予少将军衔，要我担任军政部军需设计委员，但我还是回校当教授。”1950年成都一解放，他就写信给我很兴奋地说：“现在我们都解放了，总算吐了这口气，今后有了光明前途。”他还告诉我：“在成都市，领导推选我为人民代

表，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强我当理学院院长，使我受宠若惊。”他的意愿还是不要职位，要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发展祖国科技事业、培养高级人才多做贡献，

大哥爱家乡，但更爱事业。他虽然长期在外，但是心不离家乡。他经常写信问这问那，诸如家乡年成好不好，家里是否平安，弟妹有何长进等等。在外地见到同乡，他都当亲人接待，能帮助的就热情帮助。如马锦南，家里是在仙居南门开店的，抗战时期在成都读大学，经济周转有困难，他曾给予接济，还帮助他设法改换专业转入华西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大哥先后在北平、成都等地高等院校任教，总是以事业为重，一心扑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上。1944年，父亲突然病故，当时他在成都不克回家，不少亲属却感叹说：“父母在，不远游。”但他还是忍住悲痛，后来，他回忆往事，虽然感到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但是他认为这是“忠孝不能两全”，也是没有办法的。他说：“1921年，我离开家乡，想不到以后就再也见不到爸爸了。1937年我在北平出国前夕，也曾想先回家一趟，看看父母弟妹，只因当时日寇侵华，形势吃紧，无法实现。”大哥一生不仅自己发愤图强走南闯北，还经常鼓励后辈青年艰苦奋斗，开辟新路。据说有位堂侄女写信告诉他要去内蒙，别人都有非议说她年过四十还要去边疆，但他满腔热情给予同情和支持，并赞许她有魄力，敢闯出去。

大哥衷心拥护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解放后，他满怀激情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推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他参加了民主建国会团结有影响的实业家、工程技术人员，积极做好企业改造和发展工作。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他积极配合规划筹建新的专业，并几次随校

搬迁住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三年困难时期，他曾经几次向党委提出要求给自己减少工资。1959年，他曾出席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学术交流会议，当时由于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苏联当局限制很严，一次在休会期间，他与波兰专家个别交谈，事后那位波兰人当即被叫去质问：对中国人谈什么？这件事，使他感触很深，更加激发了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感情，体会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性。在“文革”十年动乱中，他虽然蒙受不白之冤。“反动祖师爷”、“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帽子满天飞，但是他在思想上还是坚信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自己的专业。他经常学习，搞笔记，一字一句写心得体会，还翻译了几本专著。1976年，他痛心地说：“最使我恼火的是我国学术水平落后了，我因视力不好，现在也不能多看书。”

大哥关怀爱护青年一代数十年如一日，他执教50余年，学生遍布祖国大陆，还有在港台的，在国外的，成为各种高级建设人才。他对学生言传身教，谆谆善诱，自己克勤克俭，在生活上也乐于助人。他教学生要从师尊师，期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珍藏着一张和学生的合照，正面在他两旁和背后站着十几位戴着学生帽的毕业生，背面写着“赠给敬爱的爸爸”，大哥确实是青年的良师、慈父。他对我们弟妹的关怀、爱护和教诲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大哥的一言一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尊敬和怀念！

忆 沈 哲 臣 先 生

吴 平

编者按：沈哲，字哲臣，原名三善，字卿蒲，仙居横溪人。1890年生，毕业于浙江省立农校。1922年进南京军校高教班，毕业后，曾任国民党南京参谋部少校副官、桂林行营上校科长、重庆国防部铨叙二厅少将副处长、国防部联勤总部铁路运输少将副指挥官等职。金华解放后，毅然回乡务农，1950年被选为仙居私立正谊中学董事长、仙居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浙江省台州专区第一、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座谈会代表。1969年3月病逝于家乡。

* * * *

我有幸结识沈哲臣先生于解放之前，距今已四十余年。时我在浙江医学院求学，已是共产党员；而沈先生却任职南京铁道运输指挥部少将副指挥官，为国民党高级军官。一个年青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高级军官结成莫逆之友，听来似乎难以思议。其实，沈先生青少年时正逢军阀混战，就以一介书生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后又投入抗日战争，历史造成了他当时的境况。然而，由于出身贫寒，他痛恨当时社会不良风气，更反感国民党当局屡起事端，战乱不止，祸及黎民百姓。在这一方面，我们有着共同语言。他虽居要职，然而为人朴实，作风正派，谈吐坦率，平等待人，毫无官架，乐于帮助同乡青年学生，视之为振兴家乡的希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48年初，沈先生便洞察时局将生